

个人现代性与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 的实证分析

雷鸣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从“理性人”的视角出发来分析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该文则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个人现代性对迁居意愿有重要影响。文章秉承英克尔斯的个人现代性指标——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通过对CGSS2010的数据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收入因素固然对农村居民的迁居意愿有强烈影响，但现代性的因素并未因收入的变动而发生变动。

关键词：个人现代性；农村居民；迁居意愿

作者简介：雷鸣，男，博士研究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实证社会学研究所，邮箱 mingle157@163.com。

Personal Modernity and Migration Intention of Rural Residents

LEI 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Xi'an , 710049)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on the time if internet us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social group and the time if internet use from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tatus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with the data of Shaanxi and Guangxi from the 2010 Chinese Survey of Social Change in western China. It shows that older people spend less time on the internet than young people, and married persons spend less time on the internet than unmarried person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gender and time if internet. It also shows that the people with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or higher household income will spend more time on the internet , and so do urban residents.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re i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social activity and the time if internet use, the social groups with more weak ties in the objects of social activity will spend more time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groups with lower social identity will spend more time on the internet. These conclusions preliminary reveal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time if internet use.

Key Words: personal modernity, rural residents, migration intention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 2013 年，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7.3 亿人，城镇化率也由 1978 年的 17.9% 提高到目前的 53.7%^[1]。城镇化率的上升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李克强总理就多次强调，“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

^[2]。城镇化涉及诸多方面，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口学家、社会学家提出各种影响该意愿的因素，基本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环境因素，研究表明，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加，对流入地政府的认同感的提高，以及参加流入地的各类组织都能提高农民工的留城意愿^{[3] [4] [5]}；另一类是个体因素，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个人社会资本等个体因素都会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产生影响^{[6] [7] [8]}。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一方面，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于农民工的城镇迁居意愿，对于那些没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村居民，他们的态度没有被纳入研究视野，但实际上这些人也是潜在的可能迁居城镇的居民，应该对他们的迁居意愿予以关注。另一方面，关于迁居意愿的个体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基本限于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或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等社会学变量，忽视了研究对象的人格特质等心理学变量。据此，笔者首次引入个人现代性这一因素，将其纳入城镇迁居意愿的研究，并且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全体农村居民。

一、个人现代性的含义与测量

个人现代性是指人的现代化程度，其权威研究来自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在一系列大规模跨国调查之后，他与合作者把个人现代性归结为四个主要方面：（1）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2）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3）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4）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笔者把这四个方面概称为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9]。

英克尔斯接下来对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公民性，是指作为一个见识广博的参与的公民，应该对公共事务抱有兴趣，随时了解重大的新闻事件；能动性，是指作为一个具备效能感的现代人，拒绝对生活采取被动、顺从的态度，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状况；独立性，是指作为一个高度自立的个体，对事物遵从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而不是服从传统和权威；开放性，是指作为一个开放、灵活的现代人，应该乐于接受新的经验与新的观念^[10]。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文献在提及英克尔斯对个人现代性的测量时，往往引述的是12个测量指标（此不赘述），然而阅读原著可以发现，这12个指标是英克尔斯等人进行研究时初步确定的12个主题即研究假设，并不是结论，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所代表的内容才是英克尔斯对个人现代性的总结性概括。

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孙立平、叶南客为代表的国内社会学家开始在英克尔斯的研究基础上独立探索现代人的特征，在本世纪初逐渐涌现出一些较为系统的测量指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闵学勤的“三层面”说、李东山的“四维度”说、李黎明等的“五维度”说。

闵学勤认为“现代人”应当同时具有三个属性，即“理性人”（有目的地行动以获取效用最大化），“社会人”（人的行动均受社会制约）和“经济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11]；李东山从时间维度、主体维度、价值维度、规则维度这四个维度出发编订人的现代性程度的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调查^[12]；李黎明等人则把现代人的特征概括为公共参与、开放包容、个体效能、理性精神、图新求变五个维度^[13]。

纵观英克尔斯以来的研究可以看出，对个人现代性的理论分析都是建立在英克尔斯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对个人现代性的测量指标的探讨并没有超出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这四个维度的范畴，因此，本文遵循英克尔斯的阐释，从这四点出发选取具体测量指标对个人现代性进行测量。

二、理论分析

（一）现代性的作用：一个“理念人”的解释

英克尔斯在其著作中明确表示，个人的城镇经历相对来说更能提高其现代性，城镇居民也较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的现代性^[14]。那么，它的逆命题——现代性能够提高个体的“亲城镇性”即城镇迁居意愿——是否能够成立，目前还没有答案，这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起点。

除了城镇经历，英克尔斯也论述过大众传媒和教育在提高个人现代性中的作用^[15]，而今天的中国农村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广播、电视、移动网络等传媒普及程度也非常高，很多农村居民也有城镇打工经历，理论上每个农村居民都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本文拟从社会学中理念与个人行为的关系理论出发，对与农村居民的现代性与城镇迁居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理论上的分析。

社会学中把个人秉承的价值规范、观念体系等心理特质归因于文化的作用，并认为这些特质对个人行为有直接影响。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把上帝为个人安排的生活状态叫做“天职”，而对于新教（韦伯特指加尔文教）教徒来说，天职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自己选择的、怀着一种宗教责任感去追求的紧张艰苦的事业。具体来说，劳动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还是一种精神追求，赚钱成为一种义务，勤勉、节俭这些品质既是商业繁荣的保障，也是上帝选民必备的美德^[16]。就这样，新教教义作为一套文化规范沉淀在新教徒的商业行为中，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

后续的社会学家继承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社会学理论大师帕森斯曾总结，社会行动总是受到规范和价值的制约，人们会在手段和目的两方面都进行价值评价或价值选择^[17]。当代社会学大师布迪厄也认为，文化价值观念能够塑造行动者的“技能、风格、习惯、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惯习”，而惯习与“场域”结合，就行成了“实践”，也就是社会行动^[18]。社会学家弗莱在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论证，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和预期，应该看作是一种基于道德标准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能够影响和指导人们的现实行动^[19]。

综上所述，社会学一直把文化、规范视为影响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通过内化于个人的价值与观念起作用。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理念人”的理论，它强调个人的行为会受到自身理念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个人的认知、观念来预测其相关行为。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我们承认城镇生活方式相较农村更现代，那么可以推论，个人现代性更强的农村居民理当更加接受和认同城镇生活，由此可以提出

假设 1：农村居民的现代性越强，其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

根据前文对现代性的解释，可以进一步做出下列假设：

假设 1a：农村居民的公民性程度越高，其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

假设 1b：农村居民的能动性程度越高，其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

假设 1c：农村居民的独立性程度越高，其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

假设 1d：农村居民的开放性程度越高，其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

（二）与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理念人”还是“理性人”？

以上是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对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中个人现代性如果产生影响做出的理论分析。那么它跟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相比是否仍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呢，下面笔者就引入经济学理论对其做进一步分析。

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它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其分析逻辑可以概括为，迁移意愿与迁移可能带来的收益与不迁移的收益（含迁移成本）的差值有关——如果差值是正数，那么理性的个体就会倾向迁移；如果差值为负数则不会；如果差值是零则无所谓倾向^[20]。很明显，这一逻辑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一脉相承，强调个人收益的最大化，恰与前文所述社会学理论中的“理念人”形成对照。

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虽然针对的是劳动力迁移行为，但其逻辑用来解释全体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也是合适的。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可以推论，个人如果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收益的比例越大，迁移意愿就越弱；反之，如果从非农业生产中获得收益的比例越大，迁移意愿就越强。因此，如果“理性人”假设成立，那么以下假设是成立的：

假设 2：农村居民从非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占比越高，其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

为了研究迁移意愿中“理念人”与“理性人”假设的关系，笔者进一步提出：

假设 3：非农业生产收入比例的提高，并不能改变个人现代性与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关系。

它同样有以下四个分假设，即：

假设 3a：非农业生产收入比例的提高，并不能改变公民性与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关系。

假设 3b：非农业生产收入比例的提高，并不能改变能动性与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关系。

假设 3c: 非农业生产收入比例的提高，并不能改变独立性与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关系。

假设 3d: 非农业生产收入比例的提高，并不能改变开放性与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 CGSS2010）的数据，该调查的详细情况可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网站“中国社会调查开放数据库”（网址：www.cssod.org），此不赘述。以下是研究所需变量的具体情况介绍。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问卷中的题器是“未来 5 年，您是否计划到城镇定居？”选项有“是”、“否”、“已经在城镇定居”三类。根据本研究的需要，笔者从样本中剔除了“已经定居”的群体，这样因变量“城镇迁居意愿”就是一个取值为“有”和“无”的二分变量，统计描述结果见表 1。

（二）个人现代性

如前文所述，本文秉承英克尔斯的理论，围绕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四个方面，从调查问卷中选择合适的题器来拟定指标。具体来说：

公民性是用“近一年来从事以下活动的频率”进行测量，具体指标有 2 个：“1. 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2. 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的话题”，按照频率从低到高分别给出“从不”到“总是”5 个选项，分别赋分为“1”分到“5”分。

能动性则是依据被访者对以下说法的同意程度，具体是：“1. 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2. 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3. 如果让我当政府干部，我也完全能胜任；4. 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5. 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6. 我想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按照同意程度从低到高分别给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 个选项，分别赋分为“1”分到“5”分。

独立性则是依据被访者对以下说法的同意程度，具体是：“1. 我认为对我的亲友有益的事情，即使他们不认可，我也会设法让他们做；2. 未经孩子许可，做父母的不能察看孩子的日记和信件；3. 假使我和亲戚做生意，也会事先商量好，按照协议办事”，同样按照同意程度从低到高分别给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 个选项，分别赋分为“1”分到“5”分。

开放性是用“过去一年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进行测量，具体指标有 5 个：“1. 报纸；2. 杂志；3. 广播；4. 电视；5. 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同样按照频率从低到高分别给出“从不”到“总是”5 个选项，分别赋分为“1”分到“5”分。

本文把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四个变量的上述测量指标的选项赋分（1-5 分）进行加总，此前需要对部分答案的取值根据题意进行重新赋值，如“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一题，就需要把选项的分值 1-5 重新赋值为 5-1。同时为了使各变量在衡量个人现代性上具备相同的权重，再把四个加总后的分值分别除以具体测量指标的数量，即公民性为初始总分/2；能动性为初始总分/6；独立性为初始总分/3；开放性为初始总分/5，这样得到四个取值为 1-5 的连续变量，具体统计描述结果见表 1。

（三）非农业收入比例

农村中往往以一户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收入和支出均按整个家庭进行计算；同时往往以“年”作为一个基本生产周期。所以，笔者认为家庭年收入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较合适的测量指标。CGSS2010 询问了被访者 2009 年“全年家庭总收入”和“家庭全年农业收入”，二者之差即为“家庭全年非农业收入”，再除以“全年家庭总收入”，即为“非农收入比例”，为了计算方便，笔者再把它乘以 10，具体统计描述结果见表 1。

另外，根据以往研究，笔者还把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他们的具体统计描述结果见表 1。

CGSS2010 中共有 4189 个农村居民在以上所有变量中均有取值，下表（表 1）按照这 4189 个样本量对变量进行统计描述。

表 1：变量数据描述（样本量=4189）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公民性	1.79	0.84	1	5
能动性	2.79	0.52	1	5
独立性	3.75	0.70	1	5
开放性	1.97	0.57	1	4.8
非农业收入比例	6.08	3.76	0	10
年龄（年）	47.71	14.66	17	90
受教育年限（年）	6.45	3.90	0	19
城镇迁居意愿	有 11.55%	无 88.45%		
性别	男 49.87%	女 50.13%		
婚姻状况	已婚 85.94%	未婚 14.06%		

四、建模策略与结果分析

本文把居民迁居意愿作为因变量，如上文所述，该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故采用 logistic 模型建立一组嵌套模型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建立自变量仅包括性别、年龄、受教

育年限、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的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模型 1）。第二，为了检验假设 1a–1d，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等测量个人现代性的四个自变量作为模型 2。第三，为了检验假设 2，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非农收入比例这一自变量作为模型 3。第四，为了检验假设 3a–3d，分别建立非农收入比例与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的交互项，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这四个交互项作为自变量建立模型 4。

需要注意的是，在做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模型估计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此，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在 STATA 中进行回归分析时使用“cluster”命令来调整样本在省层次上的聚集效应，这相当于传统的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地区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做法。

模型 1–模型 4 的结果见表 2，其中，第 1 列报告的结果是自变量名称，第 2–5 列报告的结果是模型中该自变量的系数，本文同时对各系数进行了显著性检验。下文将详细解释表 2 中的模型结果。

表 2 现代性对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基准模型	模型 1+ 个人现代性	模型 2+ 非农业收入比例	模型 3+ 个人现代性×非农业收入比例	
性别（参照项：女性）	0.168*	0.049	0.065	0.065
年龄（年）	-0.043***	-0.040***	-0.041***	-0.041***
受教育年限（年）	0.121***	0.055*	0.063*	0.065*
婚姻状况（参照项：未婚）	-0.019	0.039	0.056	0.052
公民性		0.166**	0.167*	0.147+
能动性		0.327**	0.349**	0.334**
独立性		0.185**	0.204**	0.181*
开放性		0.458***	0.363**	0.397**
非农业收入比例			0.063**	0.072**
公民性*非农业收入比例				-0.022
能动性*非农业收入比例				-0.014

独立性*非农业收入比例				-0.023
开放性*非农业收入比例				0.045
<hr/>				
截距项	-1.161***	-3.724***	-4.075***	-4.069***
样本量	4974	4759	4189	4189
BIC	3213.6	3047.7	2678.2	2707.9

在模型 2 中，作为个人现代性测量指标的开放性、能动性、独立性、公民性这四个自变量的系数都为正值，且在统计上都很显著。这样，假设 1a-1d 的命题都得到了支持，即农村居民的公民性越高，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其能动性越高，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其独立性越高，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其开放性越高，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同时，模型的 BIC 值比模型 1 减少了 166，证明加入个人现代性的四个变量后，模型拟合程度提高了，解释力得以加强，这也说明个人现代性在解释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总的来说，假设 1 “农村居民的现代性越强，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这一命题得到了支持。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非农业收入比例”，该变量的系数为正值，说明农村居民的家庭非农收入比例越高，城镇迁居意愿就越强，假设 2 也得到了支持。而且加入该变量后，模型的 BIC 值比模型 2 减少了 380，说明加入该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较大提高，模型的解释力也得到较大提升，这说明经济收入在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中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模型 3 中的个人现代性的四个变量的系数仍然为正值，且统计上仍然显著，这说明即便考虑了经济收入的因素，个人现代性对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的影响依然存在。

随着家庭非农业收入的提高，个人现代性对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的作用是否有差异？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表 2 中所示的四个交互项作为自变量来验证这一问题。结果显示，这四个交互项的系数都不显著，也就是说，随着家庭非农业收入比例的提高，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的对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并无显著差异，亦即农村居民的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对其城镇迁居意愿的作用都没有受到家庭非农业收入比例的影响。假设 3 的命题也得到了支持，即非农业生产收入比例的提高，并不能改变个人现代性与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关系。

综上所述，假设 1、假设 2、假设 3 均得到模型结果的支持，个人现代性对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经济收入的变动情况并未使个人现代性对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作用发生变化。

五、结论

传统的对农村居民迁居意愿的研究基本沿袭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视角，即从迁移行为给个体带来的潜在收益与迁移成本的比较来分析推断农村居民的迁居意愿。本文则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根据文化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个人现代性水平也是影响农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此，本文秉承英克尔斯总结的人的现代性的四个指标——公民性、能动性、独立性、开放性，运用全国性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个人现代性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也随之显著提高，二者之间的正向关联是成立的。

同时，本文也指出，经济收入的因素对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也存在重要影响，这说明经济学对该问题的研究视角也是合理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对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产生影响。另外，本研究也发现，在非农收入的比例不同的情况下，个人现代性对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作用并无明显不同，二者之间并未产生一种累积效果。这说明，经济因素的变化并未改变文化因素在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的作用。。

总之，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个人现代性对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中的重要作用。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农村居民城镇化中的“有形”因素的作用，而在现实中，政府也往往从产业、收入等因素来制定吸引农民迁居城镇的政策。本文的研究结论提示我们，在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过程中，人格特征等“无形”因素也是决定其迁居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也应加以考虑。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 国务院，201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 [2]李克强，2012（11），《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
- [3]段志刚、熊萍，2010（5），《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七省市的实证研究》，《西部论坛》。
- [4]曾旭辉、秦伟，2003（3），《在城农民工流程倾向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
- [5]任远，2006（3），《“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中国人口科学》。
- [6]蔡玲、徐楚桥，2009（1），《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7]李楠，2010（6），《农村外出劳动力流程与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
- [8]熊波、石人炳，2007（2），《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南方人口》。
- [9] [10] [14] [15]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1992，《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1]闵学勤，2004，《城市人的理性化与现代化：一项关于城市人行为与观念变迁的实证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12]李东山，2004（5），《人的现代化测量探索》，《天府新论》。
- [13]李黎明、雷鸣，2013，《人的现代性》，载 边燕杰 等《中国西部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6]马克斯·韦伯, 2006,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17]塔尔科特·帕森斯, 2003, 《社会行动的结构》,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18]Bourdieu,Pierre.(1984).*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Frye, Margaret .(2012).*Bright Futures in Malawi's New Dawn: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s Assertions of Ident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17(6):1565-1624.
- [20]Massey , Douglas S. (1993). Joaquin Arango , Graeme Hugo , Ali Kouaouci , Adela Pellegrino & J . Edward Taylo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3):431-466.